

日佔時期的香港

高添強

香港雖然到了 1941 年 12 月才正式直接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，但事實上早自 1930 年代初開始，香港的社會已因日軍侵華而出現一些新形勢。現在首先讓我們簡單的回顧日本侵略中國的背景。

1. 中日戰爭爆發的背景

日本自十九世紀後期明治維新開始不久，便已積極為對外擴張作準備。1887 年，日軍總參謀部更制訂一個名為〈征討清國策〉的計劃，提出以五年為期，佔略中國。結果在 1894 年，日本終借機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戰爭，史稱「甲午戰爭」。在這場戰爭中，清軍戰敗，中國被迫簽訂〈馬關條約〉，割地賠款。

1914 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，日本即借機佔領當時德國的租借地青島。為了把中國的政治、軍事、財政及領土置於控制下，日本更於 1915 年初向當時中國的軍閥袁世凱提出著名的〈二十一條條款〉。然而，這個喪權辱國的條款，由於舉國的反對，最後並未得到國會的批准。

及至 1920 年代，隨著中國日益高漲的民族醒覺和國民革命軍的北伐，日本統治者深感不安。1927 年，日本內閣召集軍方首領及駐華使節，討論武力干預中國與對華政策等問題。不久，內閣首相田中義一提出奏摺（即「田中奏摺」），詳盡暴露征服中國的意圖；並不惜因而與美國開戰。在隨後的幾年間，日本多次在中國的東北挑起事端，企圖攫取東三省。

1931 年 9 月 18 日夜，日軍自行炸毀一段南滿鐵路，卻誣指為中國東北軍所為。日軍遂以此為藉口，於當夜攻擊東北軍，同時炮轟瀋陽城，導致「九一八事變」。日軍侵華戰爭從此展開。到了 1937 年，日本認為要達到其獨佔中國的目的，局部地區的作戰行動已不可行，於是藉「七七事變」（或稱「蘆溝橋事變」），全面侵略中國。

2. 開戰前香港的形勢

· 日軍侵佔廣東

自日軍侵華戰爭爆發後，由於中國東部的海岸遭受日軍的封鎖，廣州一帶的華南沿海地區，漸漸成為中國從海外輸入物資的重要孔道。為了切斷這條物資補給線，日軍在 1938 年中，決定發動廣東作戰。同年十月，日軍第三十八師團登陸大亞灣。由於當時中國政府放在華南的防禦力量較薄，日軍得以迅速推進，淡水、惠州、增城等地，相繼陷落。廣州最後亦於同月 21 日失陷。自此以後，日軍不但切斷了經港澳地區往內地的物資輸送路線，而且更為日後的南侵，建立了一個基地。香港從此亦處於日軍直接威脅之下。

· 蓬勃的抗日運動

從「九一八事變」開始至香港淪陷的十年間，抗日活動在香港一直很活躍，當時港人的愛國情緒，可以說在香港歷史上前所未見。

「九一八事變」發生後，香港迅速出現大規模的反日示威，僑居香港的日人甚至成為襲擊的對象。由於騷動持續，駐港英軍亦奉召出動，以維持市面的秩序。其後的數年間，在大部分的中文學校裡，愛國教育成了主要的課題。不少在這些學校任教的老師，便是從淪陷區逃出來知識份子。此外，體格訓練亦受到額外的重視，一些學校甚至實行軍事訓練，又或組成「大刀隊」之類的半軍事組織，以期學生將來或會投身抗日戰爭的一日。

除了學校教育外，當時香港蓬勃的出版事業，亦為抗日思想作出巨大的支援。其實早自十九世紀末，香港已經是不少鼓吹革命及愛國思想的報刊根據地。及至 1930 年代，特別是 1937 年上海遭受日軍的攻擊及包圍後，不少原居上海的文化界人士及知識分子南逃抵港，隨即出版報刊。這段時期的報刊，很多開宗明義的指出它們的出版目的，就是鼓吹抗日。另一方面，香港的電影工作者，亦於此時攝製了多齣著名的抗日電影，樹立了香港電影的愛國傳統，如《最後關頭》、《民族的吼聲》、《孤島天堂》、《前程萬里》等。亦由於這一傳統，到了日佔時期，幾乎所有的香港電影工作者，都拒絕與日人合作，使日人希望藉本地電影以作宣傳的計劃落空。

這段時期，在香港出現眾多的抗日組織。其中最著名的，要算是由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女士發起的「保衛中國同盟」(1938年)。這組織的成立目的，就是向海外人士及華僑推動抗日救國的主張，並募集經費、藥物及醫療器材，支援中國的抗日鬥爭。此外，各式各樣的青年團、婦女會、學生賑濟會、同鄉會、華商會等，也紛紛成立又或擴大服務，以金錢或物資，支援抗戰。這些團體的籌款形式多不勝數，包括定期捐款、特別捐款、獻金、義賣、義演、募捐物資、購買救國公債等。在這期間，不僅華僑富商慷慨捐輸，就連不少貧苦的低下層市民也節衣縮食，踴躍認捐。例如1938年8月，70多名中環及深水埗小販，合力舉行義賣。其後，其他小販及商人也紛紛加入，結果一個月內便籌得款項超過一百萬港元。一些本地居民，更組成慰勞會又或回鄉服務團等，前赴還未給日軍佔領的自由區如惠州、曲江、桂林等，甚至遠赴昆明、重慶這些大後方，為抗日戰爭出力。

· 難民的湧入

「七七事變」後，中日終於爆發全面的戰爭。在其後的一年多，上海、南京、武漢、廣州等大城市相繼失陷；其中特別是廣州一役後，大量難民湧入香港。香港的人口亦由1931年的約84萬，激增至1941年的160多萬。這給香港帶來極嚴重的居住、糧食、醫療、衛生及治安問題。當時香港不論政府又或慈善機構，莫不為救濟難民而疲於奔命。

為了解決難民的居住問題，政府於是在北角、九龍仔、京士柏、馬頭涌、牛頭角等地，興建一些簡陋的難民營，並聯同一些慈善機構，提供基本的衣、食、住、和醫療服務。但由於難民實在太多的原故，數以萬計的難民仍被迫露宿街頭甚至野外。惡劣的居住及衛生條件結果導致霍亂、腦膜炎等疫症猖獗。此外，因營養不良而導致死亡的例子，可說無日無之。

另一方面，由於當時香港地位特殊，不少中國的政要及名人，均先後在這段時期暫居香港，除上文提到的宋慶齡女士外，還有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、國民政府的宋子文、孔祥熙、孫科、顏惠慶及上海聞人杜月笙等。這些顯赫一時的人物，倒也給香港帶來另一番的熱鬧。

· 香港的備戰措施

踏入 1930 年代的下半期，國際局勢開始急劇惡化，特別是 1938 年底日軍佔領廣州後，英日關係日趨緊張。從 1938 年到 1941 年的三年間，日海、空軍多次闖入香港境內進行挑釁，造成數十名香港居民傷亡。

面對日軍的威脅，英軍的防衛策略，鑑於香港守軍兵力不足（正規軍只得四營），防衛重點只能放在港島。新界及九龍即使受襲，也不會作出重大的抵抗，防禦設想也只在於破壞和拆除重要的設施。位於九龍北面剛建成的「醉酒灣防線」*，亦因而被迫放棄。雖然開戰前香港的守軍因得兩營加拿大軍的增援，「醉酒灣防線」再被從新使用起來，但自始至終，防禦港島仍是整個防衛計劃的重心。

民間方面，早於 1939 年夏天，港府已隨英國通過義務兵役法案，規定所有 18 至 41 歲之間的英籍男子均須服役；同時徵召條件適合的男子加入義勇軍。此外，一些重要的地點都被列作禁區又或警衛區。到了 1940 年中，港府開始興建大量的防空洞，並多次舉行防空演習及擴大徵集防空隊員。這年 6 月，香港宣佈進入非常時期，居港的歐籍婦孺亦被安排撤離香港，前往澳洲。

3. 十八天戰事

· 新界及九龍的陷落

1941 年 12 月 8 日早上約 8 時，日軍轟炸機在戰鬥機的保護下，先後襲擊啟德機場和深水埗兵營；陸軍則以工兵及步兵作先遣部隊，渡過深圳河進入新界，正式開始對香港的攻擊。

日軍的侵略部隊，是以酒井隆中將統率的第 23 軍第 38 師團為主力。此外，協同攻擊的還有特別為這次作戰而調來的炮兵隊及航空部隊。以兵力及火力來說，日軍都遠在守軍之上。另一點對日軍有利的是：戰爭爆發以前，由於出色的情報搜集工作，日軍已充分掌握了守軍的資料及香港防衛的情況。還有，開戰時由於日海、空軍已在西南太平洋一帶取得絕對優勢，故戰爭爆發後，香港守軍已沒有獲得增援的希望。

* ‘醉酒灣防線’ (Gin Drinkers Line) 戰前原稱 ‘The Inner Line’，‘醉酒灣防線’ 一詞是戰後才開始使用。

攻擊開始後，日軍即把三個步兵聯（團）隊分成左、右翼及迂迴隊進犯新界。由於守軍放棄新界的戰略，到了開戰後的第二天，日軍已推進至大帽山及馬屎水一帶。英軍及義勇軍的爆破阻延部隊且戰且退，最後撤入「醉酒灣防線」。當天午夜，日軍夜襲城門碉堡陣地成功，打開了防線的缺口，即提前發動總攻擊。11 日上午，日軍已佔領西線的金山陣地，東面亦進至大老山。香港守軍司令莫德庇少將(Major-General C.M.Maltby)於當天中午下達撤出九龍的命令。西段的英、加部隊即撤回港島；中、東段的印籍部隊邊戰邊走，終於在 13 日凌晨自魔鬼山橫渡鯉魚門海峽，撤回港島。自此雙方隔著維多利亞港展開炮戰。

香港守軍經過此一階段作戰，損失並不太嚴重。莫德庇少將即重新部署港島的防禦，將從新界及九龍撤回的部隊與港島原來守軍混合編成東、西兩旅。日軍亦在加緊準備登陸港島之餘，於 13 日及 17 日兩次派軍使到港島招降，但均被港督楊慕琦(Sir Mark Young)所拒。

· 港島的陷落

日軍兩次欲不戰而下港島的招降計劃失敗後，最後於 18 日晚上在微雨和濃煙的掩護下（北角油庫於早一天的炮戰中中彈，以致兩天來維多利亞港的東北部一直濃罩著厚厚的黑煙），登陸港島北角、鯽魚涌及筲箕灣。

日軍登陸後，遭受派駐該處一帶的印軍一些抵抗，然而他們仍成功確立登陸點，並迅速向高地進發，計劃穩定陣腳後即迂迴攻擊港島北部的市區。19 日黎明前，日軍已佔據柏架山及畢拿山。守軍東旅被迫向赤柱方面後撤；西旅則於黃泥涌峽（今陽明山莊一帶）與日軍激戰，旅長羅遜准將亦在此地力戰而亡。

由於守軍在金馬倫山、灣仔峽、馬己仙峽等處都築有堅固的防禦工事，且一直頑強抵抗，日軍進擊一時受阻，傷亡頗重，未能一舉攻佔全島。另一方面，守軍雖曾多次進行零星的反擊，但都未能奪回失地。

20 日後，日軍重炮及野戰炮部隊等陸續登上港島助戰。原留在九龍的兩營步兵也渡海增援；加上天氣好轉，日軍機得以頻頻出擊助戰。經過一輪苦戰，日軍於 22 日攻陷金馬倫山，灣仔峽和摩利臣山也危在旦夕；南部的淺水灣一帶亦告陷落。至此，港島的大部分陣地除赤柱炮台外，已失去防禦能力。

· 投降

到了 24 日，戰局其實已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，但楊慕琦仍沒有投降之打算，且英國首相邱吉爾亦曾多次拍發電報，指香港不能懷有投降之意，務必頑抗到底。

聖誕日早上，日軍再一次向楊慕琦勸降，楊慕琦仍置之不理。中午，日軍加強攻勢，灣仔一帶甚至進入巷戰的階段。3 時，莫德庇少將向楊慕琦報告戰局，說明港島北岸的陣線均已瓦解，大炮與彈藥均缺乏，加上水源已斷，實在無力繼續戰鬥，若抵抗下去只會犧牲更多性命。結果楊慕琦接受莫德庇的建議，向日軍提出無條件投降，並於當天黃昏渡海至半島酒店的日軍戰鬥司令室，正式簽署降書。十八日戰鬥，至此結束。

在這場香港歷來上最大規模的戰事中，雙方傷亡人數高達 6,000 人以上。香港守軍兵力、火力雖遠在日軍之下，卻在劣勢中仍奮勇抵抗，可是由於外援斷絕，終於未能扭轉敗局。

4. 三年零八個月

· 淪陷前後的混亂

早於日軍攻佔新界及九龍時，不少黑社會分子及流氓，趁著守軍和警察撤退，在九龍大舉搶劫及勒索。其後因發電廠被毀，夜間全市漆黑一片，九龍頓成無法無天的世界。香港守軍投降前後，市區的盜賊更形猖獗，流氓到處搶劫勒索、勒收保護費、傷人甚至強姦婦女，社會秩序蕩然無存。一些坊眾因此組織街坊自衛隊，避免受到暴徒的侵擾。

可是更可怕的事接踵而至。香港守軍投降後，日軍高層為獎賞部隊，特別發假三天，放縱部隊胡作非為。日軍因而肆意姦淫劫掠和殺戮。無數居民特別是婦女，人人自危。此外，日軍到處搜捕抗日份子及「搗亂分子」。不少市民因而被抓，不幸的更被即時殺害。所謂「搗亂分子」，不少其實只是饑民而已。

· 戰俘及英籍居民的處理

日軍佔領香港後，最初並沒有為收容戰俘作出任何的計劃。他們將大部分戰俘驅往深水埗兵營（今深水埗公園、麗安及麗閣邨一帶），少數則被囚於北角的難民營。初期日軍看守較鬆懈，但自一些戰俘成功逃脫後，看守變得嚴密起來。不久，日軍把士兵與軍官分開囚禁，前者仍留在深水埗，後者則被遷至亞皆老街的集中營（今香港眼科醫院至九龍醫院一帶）。至於印籍戰俘，由於可被用作宣傳工具，大部分被囚一段短時期後，即被釋放。1942 年秋天開始，先後約有 3,000 名戰俘被運往日本作苦工，但其中近 1,100 人在往日本途中遇事喪生。留港的戰俘都被迫從事如修路及擴建機場等勞務。

至於被認為是「敵性國民」的英裔（也包括一些美籍人士，但他們大部分被囚不到一年便被遣送回國）居民，除一少部分有利用價值如銀行家外，不論男女老幼，均被送至赤柱作拘留。

由於居住環境十分擠迫，加上缺乏食物及醫藥等，大部分的戰俘及被拘留人士在囚禁期間均處於營養不良、飢餓及疾病的交煎之下。在營中因而死亡的人數以百計；另外，也有一些因與外界聯繫而遭日軍處決。

· 軍政時期

日軍佔領香港翌日，即著手成立以酒井隆為首的「軍政廳」政府，下轄總務、民政、經濟、司法、和海事五個部門。為了加強軍政統治，日軍得隨時宣佈戒嚴、查封房屋、拘留前香港軍政官員，並發行軍票。這段時期歷時不到兩月便結束。

另外，由於社會秩序大亂，若干紳商在日人授意下，這段時期成立一個名為「香港善後處理委員會」的過渡組織，以解決一些迫切的社會和民生問題如糧食及治安等。

· 「民政」時期

1942 年 2 月 20 日，日本宣佈香港為日本佔領地，設立總督府以代替「軍政廳」。五天後，日陸軍中將磯谷廉介履任首任香港佔領地總督，行政中心由半島酒店遷至匯豐銀行大廈。軍政時期結束，「民政」時期隨即開始。這一段時期直至日本投降為止，長達三年半

總督部是日本戰時內閣直轄機構之一，香港成為日本的領地，地位與台灣及朝鮮一樣，因此和其他東南亞的日佔地區不同，日本並沒有在港籌組所謂「自治」的傀儡政府。

總督部的最高行政長官是總督，總督之下的行政首長是總務長官，負責協調和監督所有政府部門（共七個：民治、財政、交通、經濟、報導、管理和外事部）的工作；此外，與總務長官同級還有負責治安、操生殺大權的憲兵隊隊長及負責防務的防衛隊隊長。總的來說，當時的港日政府在組織上遠比戰前（又或戰後）的港英政府簡單得多。這主要是因為日本佔領香港的最大目的，並不是打算藉此發展香港，而只是希望使香港成為其控制華南的中樞而已，對於政府內的架構，日人因而可簡則簡。

為了拉攏華人以達至「以華制華」的目的，磯谷廉介上任後不久，兩個由華人組成，名為「華民代表會」及「華民各界協議會」的組織雙雙成立。這兩個簡稱為「兩華會」的諮詢組織，代替了戰前的行政及立法局。理論上，「兩華會」的成員可說為政府與民眾間的橋樑。

另外，為確保政策能下達地方基層切實執行，總督部成立後，即加緊擴大軍政時期已成立的地區事務所。其形式是在民治部在港、九及新界各設一個地區事務所，所長一職，由日人出任，統轄一切。地區事務所之下，再分置多區，由當地華人出任正副區長，其職責包括物資管理、米糧分配、戶口調查、街道衛生、人口往來及其他與華人有關的行政事務。到了 1942 年中，全港共分為 28 區。這樣的分區管治模式，對香港來說，倒是前所未有的。

自日軍佔領香港後，港日當局隨即把香港「日本化」，以進一步鞏固日本在港的管治。早自香港淪陷初，軍政廳已下令取締在公共場所展露的英文標記、告示，甚至店舖的名稱。「昭和」成為香港的年號。1942 年（昭和十七年）4 月，總督部公佈港九主要街道及地區均須改用日式名稱，如皇后大道改為明治通、彌敦道變成香取通、西環改稱山王區等。另外，一些主要機構和地點，也被冠上日式名稱，動植物公園變成大正公園，半島酒店成為東亞酒店。此外，為了灌輸日本的文化及價值觀念給港人，日本的節日、天皇的壽辰等，亦在香港作大事的慶祝。官方語言自然以日語代替英語。在學校內，仍有機會上學的學童，除了必須學習日語外，日本的道德禮法以至國情，也在學習之列。

日佔初期，香港人口估計高達 150 萬（少部分的人口在開戰後不久即離港，故數字與開戰前有少許出入），這除了帶來嚴重的糧食負擔外，亦對香港防衛的資源分配構成重大的問題。因此早在 1942 年 1 月，軍政廳即頒佈華人疏散方案，以勸諭、利誘，甚至威逼等方法迫使居民特別是無以為生者離港。在香港淪陷後的一年間，估計超過 50 萬人離港回鄉。在艱辛的回鄉途中，被暴徒、土匪掠奪或襲擊，甚至因飢寒交迫而死的，不計其數。到了 1943 年，由於糧食問題日趨嚴重，歸鄉政策的執行變得更嚴厲，憲兵隊甚至當街隨意抓人，強行押解出境。在這政策下，香港人口大幅下降，至日本投降時，只僅餘約 60 萬人。

· 殘暴統治

雖然在宣傳中，日本一直聲稱攻陷香港是為「華人從英國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」，但事實上，日本在香港的整個統治系統，比戰前的殖民政府更獨裁、官僚及腐敗；自始至終，日人所使用的手段更是殘酷和野蠻。

從軍政廳成立起，日人先後制定大量前所未有的大小規例，這些規例可怕之處，是日人隨時可以犯例為藉口，打罵、囚禁甚至殺害居民。例如不向站崗的日軍鞠躬行禮，輕則遭受掌摑，重則甚或招至殺身之禍。憲兵隊亦常藉口檢查，又或搜捕抗日分子，隨意闖入民宅，為所欲為。此外，為了統制言論和消息，所有新聞通訊及文化活動，莫不受到極嚴格的檢查。

自日佔初期開始，日軍一方面沒收貿易商的資產，控制存糧，另一方面卻對居民的糧食、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實施配給制度。自 1943 年起，日軍在戰場上開始失利，造成運輸困難，配給制度更形苛刻。在日佔的最後兩年間，不少居民因食物不足，被迫進食木薯粉、花生麩、番薯藤，甚至樹葉樹根充飢，餓死的居民更無日無之。

日軍佔領香港後，隨即發行軍票作為貨幣；並肆意提高軍票面值，以方便其掠奪物資。到了 1943 年中，港日政府更宣佈軍票為香港唯一的合法流通貨幣。由於軍票的濫發，影響所及，香港的物價飛漲，投機風潮澎湃。到了日佔後期，日人貪污成風，一般市民的生活，苦不堪言。不到兩年間，香港由一個繁盛的轉口港，變成一個市面蕭條的死港。

抗日活動

日佔期間，分別有兩個組織在香港作抗日活動。首先出現的是一支開戰前已活躍廣東東江一帶的游擊隊（1943 年底正式稱為「東江縱隊」）；另一個則是由一名前香港大學教授於香港淪陷後籌組，名為「英軍服務團」的軍事組織。

「七七事變」後，為了爭取港澳居民及海外華僑支援八路軍及新四軍抗日，中共在香港成立了一個籌募捐款和物資的辦事處。廣州淪陷後不久，這辦事處即組成一支武裝游擊隊，由最初的百多人一直發展至數千人，並設立小型兵工廠，不斷在日軍後方伺機破壞。香港淪陷後不久，游擊隊成立總隊部，下分五個大隊，其中一個即為港九大隊（後改稱獨立大隊）。大隊以下分區建立中隊，在香港活躍的就有大埔、元朗及西貢中隊。較後成立的還有海上、大嶼山和市區中隊；這些中隊的成員不少都是香港的居民。

日佔期間，這些游擊活動，一直使日軍頭痛不已。淪陷初期，不少知名人士（如何香凝、茅盾、夏衍、千家駒、廖沫沙等）和抗日分子，為避免成為日人的宣傳工具，便是在游擊隊的協助下逃離香港。此外，港九大隊的工作，還包括刺探情報、清除盤據新界的匪幫、在適當及有利的情形下爆破日軍的物資倉庫和擾亂其運輸補給（例如位於窩打老道的九廣鐵路火車橋，游擊隊便曾成功爆破），並以武力對抗巡邏的日軍、憲兵和漢奸等。

至於「英軍服務團」（British Army Aid Group, 簡稱 BAAG），其創辦人賴廉士（Lindsay T. Ride）原是前港大生理學教授，同時亦任義勇軍野戰救傷隊的指揮官。香港淪陷後不久，賴廉士與三名屬員在港九大隊的協助下，成功從深水埗戰俘營逃至惠州，再輾轉抵達戰時廣東省臨時省會曲江（今韶關市）。1942 年 3 月，賴廉士得到英軍高層及蔣介石的同意，創辦英軍服務團，並先後在曲江設立團總部及惠州成立前哨基地。其工作重點是派遣特工到香港搜集情報並作分析、運送物資進出香港、協助營救戰俘及其他人士逃出香港、傳遞消息進出戰俘營，並向戰俘和被拘留人士秘密供應特別是藥物等的物資。

英軍服務團成立後，雖然在營救戰俘的工作上因戰俘身體孱弱等原因，使成功的例子絕無僅有；但在其他方面，仍是相當成功的。

然而，不論東江縱隊又或英軍服務團，在執行任務過程中若成員給日軍拿獲的話，可說九死一生。今天在西灣國殤墳場的牆壁上，便刻有部分英軍服務團殉難團員的名字；另外，豎立在西貢斬竹灣的抗日英烈紀念碑，就是紀念在日佔時期犧牲的游擊隊隊員。

5. 重光

· 戰後香港的歸屬問題

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，軸心國敗象已呈，故有關這些國家所佔地區的前途問題，在國際間開始受到注視。香港方面，當時的輿論普遍認為香港是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的象徵，因而主張把她交還中國。此時中國已擠身大國之列，當然希望消除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。美國總統羅斯福也多次主張香港歸還中國，使之成為國際自由港。但另一方面，英國卻極力要求戰後保持包括香港在內的遠東「殖民地」，首相邱吉爾並在香港問題上多次表態，對交還一事，寸步不讓。由於英國的強硬態度及戰勝國間的利益關係，香港的歸屬問題始終沒有在國際會議上提出。

· 英國接收香港的經過

1945年8月15日，日皇正式向盟國宣佈無條件投降。早一天前，英軍總參謀部已得知日本將投降的消息，便指令其駐華大使通知中國，謂英國將接收香港及恢復香港的管治；同時命令其太平洋艦隊組織一支特遣隊，趕往香港受降。當時國民政府大加反對，幾經交涉，國民政府最後同意英方代表可在中、英兩國政府的授權下，在港接受日軍的投降。

另一方面，當時身在赤柱拘留營的前港府輔政司詹遜 (F.C. Gimson)，亦已從英國駐重慶大使方面接到指示，著他在日本投降後，即接掌香港政務，以待英國的先遣部隊抵達。8月28日，詹遜在電台宣佈，他已是當前英國駐港的首席代表。

8月30日，英國太平洋艦隊的特遣艦隊抵港，其指揮官夏慤少將同日正式獲任軍政府總督一職，同時兼任部隊總司令。由於英國早在1942年底已決定戰爭結束初期，將以軍政府形式管治前殖民地，故夏慤接管香港後，即於9月1日頒佈「軍政府統治公告」，正式宣佈成立軍政府。英軍控制香港後，立刻接收政府機關及船塢，釋放戰俘和被囚的英籍僑民，並確保重要的公共設施如水、電等

的供應。警署、航政署等部門亦陸續恢復工作。公共秩序在英軍的協助下，大致得以維持。

· 重建香港

戰爭結束後，日人在香港留下來的問題極多，包括八成人口營養不足、醫療衛生條件極差、傳染病猖獗、大部分的適齡學童失學、不少房屋受到破壞又或日久失修等。此外，大量香港原來居民及難民的湧進（1945 年底，人口估計已回升到 100 萬，這段時期平均每月再有 10 萬人湧入），更使情況進一步惡化。為了迅速重建香港，夏愨的軍政府一開始便執行全面的統制政策。對外貿易、工商業，以至一般市民的糧食、燃料、日用品、住屋和工資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統制。可是供求一時仍難於協調，黑市大行其道。不過，軍政府對於黑市貨物，還是採取放任的態度。

統制政策實施兩個月後，軍政府決定除部分物資外，恢復自由貿易。1946 年上半年，香港經濟已經恢復一定水平，貿易漸復常態。

由於大亂之後人心思治，軍政府的工作總算沒有出現重大的問題，8 個月的艱難歲月終於度過。1946 年 5 月，楊慕琦重返香港，復任港督；軍政時期宣佈結束。